

问道晋商

[刘建生 李东○编著]

W E N D A O

J I N S H A N G



山西省晋商文化研究会会长，山西大学晋商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导刘建生为广大读者倾情奉献的**通俗读本**
晋商那些事儿，老百姓看得懂，有意思

高曰伟书作重现晋商创业历程

解以义了家国一体、儒商一体、开拓创新、
制利的晋商精神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山西经济出版社

问道晋商

|刘建生 李东○编著|

W E N D A O

J I N S H A N G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山西经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问道晋商 / 刘建生, 李东编著. — 太原: 山西经出版社, 2016.1

ISBN 978 - 7 - 80767 - 990 - 5

I. ①问… II. ①刘… ②李… III. ①晋商 – 通俗读物 IV. ①F7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13503 号

问道晋商

编 著: 刘建生 李 东

出版人: 孙志勇

策 划: 董利斌

责任编辑: 解荣慧

封面设计: 阎宏睿

版式设计: 弘成图文

出版者: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经济出版社

地 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4922133 (市场部)

0351-4922085 (总编室)

E-mail: scb@sxjjcb.com (市场部)

zbs@sxjjcb.com (总编室)

网 址: www.sxjjcb.com

经 销 者: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经济出版社

承 印 者: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0

字 数: 328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978-7-80767-990-5

定 价: 48.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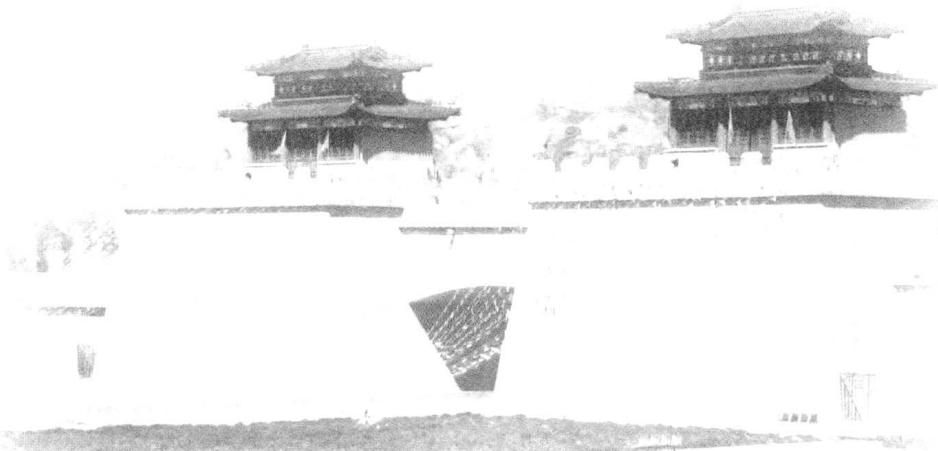
问逐晋商

康熙皇帝说：“今朕行历吴越州郡，察其市肆贸易多系晋省之人，而土著者盖寡。”

山西巡抚刘于义上奏说：“山右积习，重利之念，甚于重名，子弟之俊秀者，多入贸易一途，其次宁为胥吏，至中材以下方使之读书应试。”

雍正帝朱批：“山右大约商贾居首，其次者犹肯力农，再次者谋入营伍，最下者方令读书应试，朕所悉知。”

沈思孝在《晋录》中记载：“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



杀虎口新关

晋商给我们留下了什么^{*}

回望山西历史和山西的经济发展史，不能不提晋商。明清晋商曾在华夏农业文明中创造了令世人瞩目的商业奇迹，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其活跃时间之长，辐射范围之广，资本之雄厚，经营项目之多，从业人数之众，在世界商业史上亦属罕见。他们驰骋四方，雄居商界五个多世纪。南起香港、加尔各答，北到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东到大阪、神户、横滨、仁川，西达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都曾有过山西商人的足迹。从雁门关外杀虎口的“车辙马迹”到黄河上的古老渡口，从蒙古草原的骆驼商队到长江口起锚出海的商船，从山西境内的深宅大院到扬州的亢园、苏州的全晋会馆，均反映了晋商昔日的活动盛况。甚至在许多地区形成了“晋商不至、产无所泄”的局面。据统计，清道光时期，仅山西商人垄断的恰克图贸易，每年的贸易额即占俄国全部对外贸易额的40%~60%，最高时达60%以上，而中国对外输出商品的16%也通过这里进入俄国和欧洲市场。晋商艰辛的远足贸易，使他们各自的财富积累从白银几十万两到数百万两，进而发展到千万两的水平。

明清晋商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他们不畏艰险、披荆斩

* 本文应《山西日报》常务副总编、《山西晚报》总编翁小绵之约，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在2006年2月15日《山西晚报》第二版予以发表，现收入本书以作代序，并进行了修改补充，在此特对翁总及编辑曹廷国同志一并致以谢意。

棘、栉风沐雨，翻越千山万水，踏遍浩瀚大漠；他们勇于创新，敢于冒险，争当天下先；他们信守商业道德，坚持义中取利，将信誉看得高于一切，“宁叫赔折腰，不让客吃亏”；他们以商为本、重商立业，认为“商与仕异术而同心”，可作为一项毕生的崇高事业来追求，能作为实现人生价值的一个途径；他们节俭勤奋、厚重守成，从小买卖至大发展，从走村串户的“货郎挑”逐渐发展为“非数十万不称富”的豪商大贾；他们同舟共济，明理诚信、精于管理，从“合伙而商”到“股份经营”，从长途贩运到金融汇兑，富有独具特色的经商理念与经营艺术；他们善于利用国家政策，抓住历史机遇，适时转型，从“开中法”到“折色制”，从北部通商到下海贩铜，从汇通天下到兴办实业，始终处于政策前沿，独领风骚，游刃于政策与商术之间。

近现代以来，在战乱纷扰中，晋商精神日渐衰微。山西人日渐重政治轻经济、重生产轻流通、重重工业轻轻工业、重资源禀赋轻他山之石。大市场观念逐渐被本本意识、山沟意识、诸侯意识所禁锢，在既定的框架中不断自我封闭，在墨守成规中屡屡错失发展机遇。改革开放后，山西作为能源重化工基地，为全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老祖宗艰苦创业、敢拼敢闯的精神失传了，同舟共济、信誉至上的商业理念淡化了，以商为本、重商立业的价值追求蜕化了。“节俭勤奋、明理诚信、精于管理、勇于开拓”的晋商精神被少数路径依赖的“煤老板”形象所替代。以致山西经济不仅远远落后于沿海沿边地区，甚至也落后于周边省区。这既有地理、体制、政策等方面的因素，更重要的是思想观念方面的禁锢和自闭。

生活始终朝着未来，而悟性则向着过去。山西曾有过辉煌，亦将迎来成功的未来。但要在日趋激烈的国内外竞争中占据优势，后来居上，重振晋商雄风，振兴山西经济，再塑山西形象，我们必须改变传统

的官本位思想，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与服务水平，既要依托资源优势，重视工业建设，也要增强重商立业的价值观念，提高商业服务与竞争意识。做到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突破“宁为鸡头，不为凤尾”的劣根观念，整合资源，协调发展。既培育高竞争力的企业集团，打造“航母群”，又哺育在市场中具有特色、敢于向狮子“亮剑”的“群狼”。改善山西的投资环境，营造重商、亲商、安商、富商的良好氛围。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曾说：“任何一项伟大的事业背后，都必须存在着一种无形的巨大的精神力量。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精神力量一定与该项事业的社会文化背景有着密切的渊源。”因此，振兴山西经济，营造良好发展环境，厚重的历史文化与优良的商业传统无疑是可资利用的最有效的一大社会资源。

另一方面，明清晋商也留给了我们一笔丰厚的物质财富。作为晋商精神与文化的载体，明清晋商巨族所遗留下来的一座座豪宅大院、商号店铺与商业老街相互映衬，形成了一组特色鲜明、风情浓郁的商业民俗景观，全方位地展现了明清时代包括建筑、商业、金融、民俗、艺术、教育以至理念在内的社会生活画卷，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和独特的观赏价值。近年来，晋商文化旅游区在山西乃至全国独树一帜，吸引了海内外众多游客，影响越来越大，知名度和美誉度愈来愈高，给我们创造着巨大的经济效益和无限生机。

然而，在晋商旅游区的开发、建设与发展过程中，也存在一些各自为政、布展雷同、消费欺诈、服务不到位等问题。需要我们继续加强资源整合、形象塑造、品牌创建与宣传促销建设。以宏观调控、突显特色为切入点，以平遥古城、榆次老城、常家庄园、乔家大院、渠家大院、曹家大院、王家大院、雁门关、杀虎口、大阳镇、荫城镇等历史遗存为龙头，整合其他各种民宅大院、商号店铺旧址，形成统一的晋商品牌；

突出晋商历史文化内涵，加强名、古、奇、绝的宣传和旅游产品的开发；扩大招商引资，优化景区、景点的环境，强化服务与市场的管理，打造良好的旅游形象。同时，还必须开阔视野，转变思维，跳出晋商看晋商，跳出大院看大院，跳出山西看山西，立足山西看全国。

总之，明清晋商不仅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无形资产，而且也留给了我们丰厚的物质财富和有形资产。在当前世界经济一体化和日趋激烈的国内外竞争背景下，我们要用足、用好明清晋商给我们留下的各种物质、精神财富。以经济为择业之首，以进取为敬业之魂，以远见为展业之羽，以创新为恒业之本，以严管为兴业之法，以勤俭为守业之根。特别是要求真务实，实实在在，把思想真正统一到省委、省政府科学发展战略的思路上，上下一致，群策群力，为实现山西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和历史性飞跃添砖加瓦。试想：我们山西曾经错过了太阳，难道还要再错过月亮？

刘志光

2016年1月

目录

■ 识时务弃仕从商 抓机遇借势崛起

一 山无重数周遭碧，花不知名分外娇	28
二 域外江天重飞渡，茶路万里溢馨香	18
三 贸易交涉中俄国，晋商称雄恰克图	1
四 开拓大漠旅蒙商，独占鳌头大盛魁	41
五 清政府北边设卡，杀虎口晋商北游	49
六 塞上明珠张家口，往来经济山西人	58
七 河东盐池皇天赐，开中法兴出『纲商』	68
八 报国不为身家计，铜帮涉险渡扶桑	79
九 镖旗猎猎无觅处，票号骤兴日升昌	85
十 介休侯氏具慧眼，蔚字号起亦流芳	95
三晋巨富出显族 百年声望传千古	116 106 99
三 灵石王氏财势旺，红门堡内是非多	

四 白银山积似雪峰，阳泉张氏有豪名

五 长玉川东家渠氏，兴工业双福盈家

六 官荫商户谋奇利，张王权势耀蒲州

144 134 126

■ 扬名商界留传奇 历经兴衰演春秋

一 先有乔家复字号，后有蒙地包头城

二 山西票帮传佳话，汇通天下美名扬

三 晋商票号合盛元，扶桑国里尽朝晖

四 独树一帜辟蹊径，登高望远大德通

五 借问酒家何处有，乾隆御笔『都一处』

六 酱园京城香百里，童叟无欺六必居

七 广升秘制定坤丹，阴阳燮理续龙脉

八 酸香郁冽味悠长，百年陈醋造晋商

九 千载汾酒香四溢，行商传技美名扬

十 名扬并州恒义诚，誉冠三晋老鼠窟

195 189 183 178 175 171 169 166 154 149

■ 风云变幻实难测 流水落花春去也

一 庚子国变记国耻，西学入晋图自强

二 张之洞发轫洋务，胡聘之『点火』山西

三 求自强功亏一篑，论筑路『铁马』难行

四 争利权群情激愤，自筑路彰显精神

五 乌金如带储山右，英帝垂涎欲瓜分

六 力保矿权归三晋，文瀛湖畔起狂飙

七 荡杨踰闲夸奢富，玩物丧志荡家风

八 流水落花春去也，一世荣辱归于平

■ 沟通货响应有道 筚路蓝缕韵犹存

一 三晋商道传天下，诚信为训示后人

二 晋商会馆应犹在，需向寻常巷陌寻

三 商旅精神堪回味，开拓创新敢为先

■ 后记

305 299 291 274

269 265 251 239 227 217 208 198

识时务弃仕从商 抓机遇借势崛起

一 山无重数周遭碧，花不知名分外娇

明清以来山西名商巨贾辈出，晋商风采艳耀一时：“汇通四海”的祁、太、平三大票帮，东渡扶桑下海贩铜的范氏铜商，敢与广州分享外贸“秋色”的恰克图茶商，从河东发迹徙居淮浙的贩盐纲商，占全国质当业 28.6% 的典商，以及丝商、布商、粮商、铁商等不一而足，难以尽述。著名山西票商范椿年曾回忆道：“闻父老言，当清初叶，山西商人足迹已遍天下，统称两大帮：一为粮船帮，即运载各省货物于沿江河及海口贸易者；二为骆驼帮，即懋迁各种货品于内外蒙古及俄旧京莫斯科者。艰苦经营，奔波万里，其坚忍性亦殊可嘉，又值清康、雍、乾时代，一百余年之太平天下，晋商富力，日积月累……”时至今日，山西人每每谈及均颇感自豪。遥想当年大盛魁的史大学、祁县乔家堡的乔贵发、太谷北洸村的曹三喜、榆次车辋镇的常威等开业先祖竟是那样“寒酸”——肩挑负贩、沿街叫卖，时为贫穷所困，买卖几经坎坷。但他们富于开拓，巧于心计，善捕战机，苦为撑持。以卖豆腐、豆芽、切面起家，以小本经营、薄利多销发迹，由赤贫如洗到“富甲一方”。

民国时期，太谷县的教书先生刘大鹏在《退想斋日记》中的一段话，可以作为晋商兴起的最好注脚。他说：“近来吾乡风气大坏，视读书甚轻，视为商甚重，才华秀美之子弟，率皆出门为商，而读书者寥寥无几，甚且有既游庠序，竟弃儒而就商者。亦谓读书之士，多受饥寒，曷若为商

之多得银钱，俾家道之丰裕也。当此之时，为商者十八九，读书者十一二。余见读书之士，往往羡慕商人，以为吾等读书，皆穷困无聊，不能得志以行其道，每至归咎读书，此皆未得书中滋味耳。”

明朝时，宰相严嵩的儿子严世蕃曾与来客共话天下豪富，“将资产五十万两以上者列为第一级，够格



者计有十七家，其中山右三姓，徽州二姓”。昔日晋人不以从商为耻，奔波四方，一个个经营致富令人艳羡。然而，当今山西青年恋家之情尤甚：城市青年宁肯待业，坐吃老子也不愿干经商这一“丢人现眼”之事。至于街头摆摊、钉鞋、缝纫等“下九流”行当更是不齿；农村青年则坚持“守土为家”，恪守“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土窝”这一信条，将青春的活力与朝气消逝于周而复始的日出日落，倾注于产粮无多的贫瘠土地；更有甚者，一些人将青年专有并为之自豪的阳刚之气



毫不吝惜地尽情发泄于“拱猪”“搓麻”和无益的“龙门阵”。

陈旧的观念、保守的思想和封闭的心态使年青一代画地为牢，没有勇气越“雷池”一步。昔日老祖宗们“踏遍千里荒漠，劈开万顷波涛，敢为天下先”的开拓气魄和进取精神在他们身上所剩无多。结果，大把大把的钞票进了南方来晋的小裁缝、美容师、钉鞋匠和揽工者的钱袋。

历史曾恩惠三晋，而现实却在无情地戏弄晋人。遗憾的是这一点并不为人们所醒悟。求平稳、谋铁碗，或者弄个什么“长”的风气依然如故。停、等、靠、看的持平心理还在有形无形地滋生。似乎商品经济的大潮也难以开启他们固执、封闭的心扉。如果我们沿历史长河稍加上溯，将发现山西人的观念有一个读书入仕—弃仕从商—耻于言利—热衷从政的循环过程。其各阶段的主、客观原因既有联系又有不同。倘若从中探源，想必不无益处。

晋人善于顺流而动、适时调整，其价值观念在各阶段不尽相同。这既受客观条件影响，又与主观敏锐不无关系。

远在隋唐两代，为了遴选“治国安邦”之才，隋文帝、唐太宗、武则天等励精图治的帝王一反魏晋以来“门第”为重、“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九品中正制”，陆续设置进士、秀才、明法、明书、明算、一史、三史、童子、道举、开元礼等科，采取分科取士的科举制度。这种不分士庶、机会均等的入仕制度，在问世之初充满了活力，寒士们“悬梁刺股”“寒窗苦读”以求金榜题名，一展宏图。

隋唐科举制为那些满腹经纶，但因出身寒微被摒弃于仕途之外的读书人点燃了一线希望之光。随而读书之风看长，入闱应试宛如潮涌。素以务实灵慧著称的三晋俊秀之士，无论士、庶都争相跃入这一社会大潮，而且游刃有余、建功立业。据学者统计，在唐代 369 位宰相中，山西籍宰相就有狄仁杰等 62 人，约占总数的 1/6，仅闻喜裴氏一门就有 51 人登榜及第。在《唐诗鉴赏词典》所载的 196 位著名诗人中，山西人多达 22 人，仅次于河南、浙江，位居全国第三。在那些山西籍诗人中，宋之问、白居易、柳宗元、王绩、王勃、王维、王之涣等人的名篇佳作更是脍炙人口、妇孺皆知。

盛唐时期，山西文人荟萃、精英辈出，对华夏文化的繁荣有诸多贡献。然而，在明清两代，像于成龙、陈廷敬、徐继畲等中举入仕并为世人推崇、景仰者却寥若晨星、凤毛麟角。据统计：明清开科取士共 51 624

名，其中状元、榜眼、探花各 201 名。江苏一省仅状元就多达 66 名，就连荒僻的贵州也有两名举子曾独占鳌头，而山西竟与状元没有丝毫“缘分”。至于榜眼、探花也只有八人间津。如此数额，理所当然只能居全国倒数第三。

晋人在科举中黯然失色的同时，“西帮”却在商界赫然崛起。这两者究竟有什么联系？山西不乏俊秀之士，可这时又在何方？以何为业？

清代大学者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中描述山西风俗云：山西人多商于外，十余岁辄从人学贸易，俟蓄积有资，始归纳妇。纳妇后，仍出营利，率二三年一归省，其常例也。或命途蹇剥，或事故萦牵，一二十载不得归，甚或金尽裘敝，耻还乡里，萍飘蓬转，不通音讯者，亦往往有之。

曾任山西巡抚的刘于义也曾向雍正皇帝上奏说：“山右积习，重利之念甚于重名。子弟之俊秀者，多入贸易一途，其次宁为胥吏，至中材以下，方使之读书应试。”自诩为通晓下情的雍正皇帝对此不以为然，朱批讥曰：“山右大约商贾居首，其次犹肯力农，再次者谋入营伍，最下者方令读书应试。朕所悉知。习俗殊属可笑。”山西俊秀之士弃仕从商可笑与否姑且不论，但读书求仕、金榜题名在晋人眼中失去往日诱人的魅力却令人深思……

明清两代，官场变幻莫测、士林惨祸迭出，促使山西俊秀之士“多入贸易一途”。

朱明王朝定鼎之初，登基伊始、君临天下的朱元璋便急不可待地残戮功臣。为使朱家天下万世永存、长治久安，朱元璋“窃虑功臣跋扈难制，为后世子孙患，乃罗织其罪，大肆杀戮”。那些“元勋宿将，得免者盖寡”，仅蓝玉一案族诛者就有 15 000 人。而胡惟庸一案，株连所及有一公、二十一侯，坐诛者多达三万余人。

开国元勋尚且如此，读书入仕者更不在话下。据统计：《明史》列传所载的 113 名山西籍官员中只有 11 人得以善终，不足 10%。其余 102 人或被诛、抄家、灭族，或被捕、下狱、迁戍，或被贬官降职、削籍为民，或战死疆场、马革裹尸……

两榜出身的士人学子一般均历经熬三冬、捱酷暑、悬梁刺股、皓首穷经的奋斗才金榜题名，博得一官半职。然而，等待他们的并非封妻荫子、金樽美酒。许多人在政界的倾轧中成为斗争的牺牲品，被贬官、撤职、远戍瘴烟之地，甚至株连亲族，满门抄斩。如此结局岂不让人心寒！因此，

受戮之人“子孙相戒，不复仕”。

如果说朱元璋残戮功臣令人发指，那么清代文字狱则罄竹难书。它使知识分子读书入仕之途充满荆棘、危机四伏。稍有不慎，便遭杀身之祸。诸如“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且把壶儿搁半边”“一把心肠论浊清”以及“维民所止”等因文字获罪之事屡兴不绝。仅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就多至 100 余起。每次狱兴，株连甚广，累百达千，触目惊心。读书之人每每谈及，无不色变，不寒而栗。一旦祸起萧墙，不但当事人横遭杀戮、枭首示众，就连其家属、老师、学生、朋友也难以幸免。

清顺治、康熙时，“家资万金”的盲人庄廷鑨根据司马迁“左丘失明，厥有《国语》”之说，召集学人编撰《明书辑略》。书成问世时，庄廷鑨虽已作古，但他始料未及的是原想传诸后世的一部《明书辑略》由于未书清帝年号，且称努尔哈赤为建州都督而祸遗众生。当时，曾经因赃系狱，后又遇赦得出的归安县令吴之荣挟《明书辑略》向庄家敲诈索贿未果，遂恼羞成怒、入京讦告。结果庄廷鑨被掘墓戮尸，家产没官。庄氏亲族、邻里和地方官，以及为书作序、校阅、刻字、印刷、买书、卖书之人或被极刑，或被流放为奴，仅被诛者就有 70 余人。众人的鲜血染红了吴之荣的“顶子”。他因讦告有功，重新被起用，官至右佥都。

吴之荣开一代告讦“乖风”。许多“好事者”亦纷纷效法，以“检举”他人文中“隐私”为自己叩开跻身仕途的大门。从此，文字之狱愈演愈烈，读书著述者人人自危。

为保身家性命，读书人自然而然另辟蹊径、再作



良图。

封建集权统治者随意草菅人命和无情的株连，使读书人手足无措、防不胜防，一个个心灰意冷，失去了往日那种追求仕途的“热恋”之情。许多人为了保障身家性命和财产安全，只好摆脱现实的“纠缠”，“皈依”于乾嘉学派。在考据学这一与现实毫无关系的“避风港”里，置身于浩如烟海的故纸堆中，去考证一句话、一个字，纠正一个错字、补一个漏字，想必不会因涉嫌“政治问题”而犯杀戮、灭族之罪。

当众人皓首穷经、埋头考据的时候，那些求仕不成但又颇识时务的山西俊秀之士，一眼便盯住了北方军事态势和由此形成的广阔市场。

明清两代，北方军事态势为晋商的崛起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小气候”。早在明代，朱明王朝为了确保长城沿线的安全并把蒙古势力摒于漠北，特设辽东、蓟州、宣府、大同、偏头关、延绥、宁夏、固原、甘肃等九边镇，并驻屯 80 万名戍边兵丁。这条沿长城由东向西苦心经营的“九边”防卫体系，不仅构成了明王朝抵御蒙古族铁骑的塞北防线，而且形成了一个巨大而又颇具魅力的经济消费区。明政府为了解决北方边饷的来源，在洪武三年（1370 年）实行了“开中法”。由于贩盐有利可图，盐引须在北方边镇交纳粮食后换取，遂在北方边镇出现了粮食市场。由于滥发盐引、盐官失政、边盐阻滞，弘治五年（1492 年），户部尚书叶淇进行了变法，实行了“盐政纲法”，即以纳银代替纳粮草之法来发给盐引。致使“全国租税所入的银两大多撒在了这里”，问题在于谁有勇气组织货源、贩

